

澳洲大學生的「世代焦慮」

駐澳大利亞代表處教育組

全球的大學生人數自 1990 年起都在快速成長，各國的大學畢業生面對勞動市場惡化，並非臺灣大學生所獨有的現象，來自澳洲知名學府雪梨大學的 Zoe Stojanovic-Hill，同時也是該校刊物 Honi Soit 編輯小組一員，在本週《澳洲人報》高教評論專欄以自身的經驗發表有關大學生的實習，兼談當今澳洲大學生的「世代焦慮」，作者以學生視角評述實習經驗，或可作為政策制定者參考。

在不相干的領域做不支薪的實習，簡直浪費生命

Zoe 在一家已稱不上是「新創」的公司做了 3 個月不支薪的實習，工作內容設定在協助發展公司的行銷策略計畫，以利改善服務顧客的品質，一開始的任務是谷歌上網搜尋「墨西哥捲餅」的網路照片，評估哪家連鎖店的捲餅好吃，大抵像是低階研究助理型的工作，之後進階到「主要研究」的角色－開始試吃哪家的捲餅好吃，工作內容不好不壞，因為指導的老闆花了一些時間教了一些事。

「一半是公司的錯，一半是自己的錯」，當捲餅的行銷企劃告一段落後，Zoe 開始在公司裡幫忙些瑣事，影印、包裝、泡咖啡、到郵局領郵件、甚至也兼做快遞工作，有次甚至徒步走了大半個城市送一件包裹。「我的錯在於選了一個與我的主修－政府治理與國際關係毫不相干的實習，更追根究柢的是我根本念錯科系，與我擅長的閱讀與寫作扯不上邊。」

Zoe 稱，為尋找一個可以入門的機會這 3 個月的實習浪費了大約 6 千 5 百澳元，相當於在酒吧打臨時工 3 個月每小時 25 元的工資，似乎不多，但是對於一個全職大學生而言已足夠改善生活品質。「公司忙碌時，實習生成了免費的廉價勞力，公司不忙時，實習生隨時可走人不必成為公司長期的負擔，那為什麼我要執著去嘗試這個我根本不感興趣的領域實習 3 個月？」

簡言之，就是「世代焦慮」

時局多變，年輕人對於勞動市場感到一股無助的焦慮感，更糟的是針對低就業率的社會科學相關科系畢業生，大學輔導機制祭出百招加強鼓勵學生進入專業的職場，這種集體的焦慮感可說是新世代在今日的勞動市場中面對種種特殊挑戰下的情緒產出，稱作「世代焦慮」(generational anxiety)。

「澳洲近年來大學入學率屢創新高，更多人念大學，畢業後就更多人搶工作，儘管人人念大學是件好事，符合社會的公義性，但學位的價值縮水了，要進入面試的名單前，不知要累積多少經歷？上網填履歷、遠距視訊面試等等，找一份工作的經驗苦澀且乏味，不是對個人才華的肯定，業界的經驗成為求職競技場中必備的特技，就連找份實習工作都得擠破頭。」

「勞動市場彈性化，彈性勞力意謂的是勞工權益越來越少，福利縮水，眾所皆知，就在不久的未來智能取代產業的勞力，此時不難理解我所要說的世代焦慮。所謂因應彈性勞動市場「彈性職涯的正能量」、「人的一輩子可做 10 個不同工作，想想看多自由啊」全是企業華麗的說詞，和實際的經驗脫節，無法動搖我對於畢業生能夠找到一份合適工作的信念。」

「其中，有兩種學生受害最深：非為特定領域所訓練的藝術人文學系畢業生，以及為夕陽新聞業訓練的大傳系學生，藝術人文的學生要進入新聞業，不支薪的實習是一種常態，偏偏人文藝術學院的女學生特別多，數據顯示女性在職場起步晚，要趕上男性可說是難上加難。」

傾聽學生「失落的聲音」：不是不願嘗試，而是學生無力開發新的機會

「在不確定的就業市環境下，學校輔導就業工作掉漆，人人擠破頭要找業界經驗，此時不支薪的實習就成為尋職者的投資，我們不鼓勵做白工，但是要做白工的前提也要有身家背後財力的支援，不是人人可以做得起。」

Zoe 就讀的雪梨大學是澳洲八大研究型大學聯盟之一(Group of Eight, 簡稱 G8)，雪大推動學生參與實習不遺餘力，鼓勵學生勤閱求職欄及參加各類就業博覽會找實習機會，幸運者或可就由實習找到

「潛藏的工作機會」。「校方管理實習職務的方法是交由各個學院自行管控，不是每個學院有數量相當的實習機會，通常藝術人文學院的實習機會不多，學院定期寄電郵通知學生有機構找人實習，但這些機構要的人不多，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這已經不是學生不願嘗試，而是學生無力開發新的機會。」

Zoe 認為大學至少要開發一個跨學院或跨校共享實習機會的平台，協助學生與提供有實質意義的實習機構作連結，並設有可反映溝通實習結果的管道。最低底線也要符合澳洲公平工作法(Fair Work Act 2009)，實習機會要更像是技能培訓，有一定的時程、有固定的薪資補貼，可培養具體有建設性的工作技能，讓學生有工作機會的實習才有意義。

資料來源：2018 年 4 月 4 日，《澳洲人報》高教評論專欄第 32 版 Driven by generational anxiety into a pointless internship

